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痛定思痛】	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张红兵
【拒绝遗忘】	张红兵为“弑母”道歉背后	姜浩峰
【诚心忏悔】	我的“文革”经历	刘伯勤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痛定思痛】

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 张红兵 •

一

妈，我终于给您写信了。

作为您的长子，我知道您是安徽枞阳（原属桐城）石婆附近高埭村人，曾用名“忠模”：您生前无论工作、学习还是劳动，时时处处争当模范。您是一位最低级别的干部——本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在安徽五河县锦绣兰庭小区家里的书房，不孝之子我关起门来，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您的照片跪下了。我的双眼含着热泪，哽噎着给您写这封酝酿了34年的信。

在佩兰姨和梅开舅推动下，1979年10月，我为您的冤案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写了如下日记：“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掉母亲脸上的血污”。我萌发了学习法律，当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念头。

我有千言万语向您诉说，现在是时候了。

1970年2月13日夜晩，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驻地）院内的家里，因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为前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翻案、发表对中共与其他国际共运政党之间外交政策看法、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焚烧毛的画像等，被我和父亲张月昇检举、揭发。

您仅在家乡菁华中学初中读书一年。历史早已证明：虽然受到时代、认识等方面局限，但当年您发表的主要政治观点，被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等文献吸纳并表达出来！您是正确的，而我和父亲错了！

像过去无数次我在梦中寻觅您、在2012年固镇县“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在今春以来面对中、英、美、德、法、日等国记者采访一样，我再次向您忏悔、道歉：是我亲手把您出卖给邪恶并送上了断头台，妈妈！我对不起您！真的对不起！如果能赎回您宝贵的生命，我宁愿立刻去死，哪怕死一百回！

在您遇难43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您作为母亲而感到骄傲！

您的故事感动了中国和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您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平民，虽然不能与昨天刚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受到全人类尊敬的黑人前总统曼德拉相提并论，但是，您勇于独立思考、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他是一脉相承的。我要大声地说：妈妈，我爱您！

二

我还要说：假如您不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是出生在南非或其他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法治国家，当年，即使作为固镇县卫生科长的父亲张月昇和我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向县革委会人保组检举揭发、要求判您死刑并立即执行，您也不该死，不会死！

而在中国大陆，1967年1月颁布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是……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什么叫“依法惩办”？从当时经常张贴固镇街头的《布告》内容来看，就是“枪毙”！

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我和父亲狠心告发，您的冤案就不会发生，您就不会死！我们爷俩对您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说，我和父亲就是杀害您的凶手！对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否认、隐瞒。

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尽管我们绝情地告密，但毕竟无权决定您的生死。依据“公安六条”规定，当年此案被县、宿县地区逐步升级，报经安徽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判您死刑、立即执行；从2月13日发案到批准死刑，还不到2个月时间！

归根结底，是一纸恶法剥夺了您的无价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邪恶的帮凶；而杀害您的真正凶手，是具有镇压大权的国家机器！

三

我跪着给您写信，除了真诚地对所犯下的十恶不赦大罪悔过之外，还为了体验在文革中父亲和您被罚跪批斗、特别是您临死那天跪着的感受。

1970年4月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管组做出对方忠谋的刑事判决书。

1970年4月11日上午。灰云低垂，冷风袭面。固镇县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南侧广场。白底黑字的“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万人公审大会”巨幅会标。那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到了会场，亲眼看到：

您被五花大绑押上来。当登上用附近小学校的课桌临时搭建的宣判大会台时，您胸前挂的在名字上打着血淋淋红×的木牌靠近了膝盖；您突然用膝盖猛地撞击牌子！它的边缘挫痛了您，

您用非同寻常的动作表达对专制的愤慨！

您被强压跪在台上，万众瞩目。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揪住您的头发硬往下按——您要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的手一松，您的脖子一拧、短发一甩，立刻昂起了倔强的头！您怒睁双目，射出了两道仇恨的光芒！

您环顾会场四周，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当看见老邻居、西圩生产队长齐洪川时，您向他点头告别（这是10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和佩兰姨都说：在出事前，是您有意安排让梅开舅与他的长女——我舅妈定了亲）。您默默地向那些熟悉的眼睛告别……在更多生疏的脸上，您看到的是恐惧、惋惜、兴奋、冷漠、迷茫……

宣判后，为了显示威严，主持者大喊一声：“把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押赴刑场执行枪决！”2个当兵的把您提起来，架着走下木板台阶，人群中一阵骚动。在被拖上停在会台旁的大卡车时，您掉下了一只平跟带襻的黑皮鞋（这是后来舅妈告诉我的）。

我坚信：当脚上的鞋子脱落时，您一定想到了“民国18年参加共产党”的父亲方雪吾“在死之前，故意把鞋子脱下来”；想到他“名义是保小（学）校长，实际上做地下工作”；想到“他……筹备党的活动经费”；想到他“打入敌人内部工作，被……杀人灭口”（这是当年2月12日清晨，您来到东屋孩子卧室里，对我们和舅舅说的话）。

我知道：当刑车发动起来迅速驶离会场、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时，许多人跟在汽车后面追赶，去看行刑场面。您被捆绑着站立在向东急驶的车头，无情的风把您的头发吹向耳后；您背后插着自古以来沿用的“亡命旗”，它在您手臂、上身被紧勒成一团的法绳中。您一定想拼命地向车下的人和站在街道两侧围观的民众呼喊：

“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解放”！“我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好同志……搞他是错误的”！“算她（江青）给人犯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帐”！“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21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

以上是1970年2月13日夜晚您在家里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主要内容，还有您在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述”。10年后我才知道：在县看守所里，他们打掉了您的牙齿，可是您仍坚持观点不变！

我不怀疑：在东郊大木桥北半里地的刑场，望不到边的田野上，枯草萧瑟。您乌黑发亮的头发有些凌乱，脸色平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环顾四周。您似乎要看苍穹、大地最后一眼，盼望有一天人间洒满灿烂阳光……

在被凶残的刽子手踢中跌跪在地上时，您一定想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您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您被无情地剥夺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后权利！当罪恶的枪声响起，您的脑海中一定闪过我这个“憨子”的脸庞，浮现出让您爱恨交织、无法割舍的亲人们面容……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热泪在近视镜片上流淌，模糊了双眼。

四

尽管我的双臂自由、两手倚着电脑键盘打字，但跪着的两个膝盖、支撑的脚前掌骨很疼，

痛感随着时间延长不断地加剧。

我说您临死前要喊口号并非主观臆测：当夜您用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卧室里；您撕扯墙上挂的毛像和诗词手迹，从镜框里取出《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点火焚烧；在我按照父亲的命令狠心用擀面杖打了您背部两下后，您喊的就是这句口号！

可怜的妈妈！仅仅因为您说了几句赞扬或批评当时国家领导等人的话、撕下焚烧了毛泽东像等“圣物”，您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人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利！（见中国作为创始国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里，有几个制定了如此的恶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这种反人类暴行相“媲美”的，只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世纪以来欧洲“宗教裁判所”——它把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就连臭名昭著的世界法西斯主义头子希特勒，可能还没这样做！

五

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当您的魂魄飘到空中，一定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1951年秋。长江之滨安徽安庆市。在桐城大别山里放牛、只读过二三年私塾、有9年党龄、11年军龄的中共党员、25岁正营职干部的父亲与您——同年出生的军分区医疗队荣立三等功的模范护士、共青团员经组织批准结婚。菱湖公园木桥边、荷花池旁，有您们依偎的身影；钱牌楼胜利剧场里，看黄梅戏名角严凤英演出的掌声如潮，观众中有您们的笑声……

您和父亲调到皖北宿县区中心卫生院工作。父亲任医政课长，您是护士。1952年6月，女儿小胖（张芳）出生，您带病坚持工作，被选举为工会委员、提拔护理部副主任。被定为地主、“匪特”的外公死后，外婆领着佩兰姨（6岁）、梅开舅（4岁），从老家来宿县投亲。1953年9月，伴随着您产前的巨痛，我呱呱坠地；您和父亲给我起名张铁夫。父亲调任安徽怀远县卫生科长。1954年弟弟出生，您因妊高症急救后转上海中山医院。政府发放保姆工资，您请了3位奶母哺乳我们，自己坚持上班。

1960年。怀远。每月除了花光您和父亲的工资外，您兑完了二千多元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卖掉了自己的金壳手表，买洋葱头等补充家人口粮不足。父亲和弟弟得过肺结核，您计划着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为弟弟订了羊奶。吃饭时，外婆从锅里先捞出大半碗米粒递给父亲；您和外婆嚼着葱头和葱叶，吞咽着像稻糠一样扎嗓子的“无粮面”粑。日子过的艰难，最大幸福是全家8口平安度过饥荒……

六

自1970年2月7日以来，父亲就发现您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有些不正常。

从2月13日早晨去医院上班到晚上下班，您拖着长期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身躯连续工作了10多小时！而在这一天里，您连一口饭都没吃！送走在家吃晚饭的父亲在新汴河工地的3位同事后，您回家坐在堂屋里的小凳子上，在大木盆中搓洗我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连一口开水也没喝。

当时，“六亲不认”——不！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我像中了魔咒，如一头张牙舞爪、疯狂

嚎叫着撕咬猎物的野兽，对您进行了长时间批斗，直到午夜您被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捆走。我就是一头没有人性的“狼孩”！

我不知道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喝到一口水、吃上一口饭；您那孱弱的躯体怎能经受得住如此饥寒、劳累、病痛和精神的多重折磨！俗话说：“母子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当时的我，怎么对您连一点儿怜悯、同情、关爱之心都没有？我为何这样冷血？

当天早上，您是否知道父亲要您请假休息不上班的用意？您是否明白舅舅上午去医院供应室帮着您消毒时的想法？您是否懂得我和弟弟在父亲安排下，先后去找您回来吃午饭的心情？虽然做过战场军医的父亲和我们不懂医学精神症状概念，但在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您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咱家不能再承受来自外界的打击了……

七

1965年5月，您和父亲从怀远调到固镇工作。

1966年11月，14岁的姐姐张芳作为固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回家后第5天，突然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对于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没有缓过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谈起就说自己的小胖多么懂事、优秀。

1967年1月16日，您和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造反派在卫生科院内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昇！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外公的事：“张月昇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枪毙。”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长期批判斗争。

在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您被叫上台陪斗。有人拿出写有“地主分子 母老虎”的纸糊帽子逼着您戴，您大声抗议：“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因群众中也有不同意见而作罢。有人对戴着高帽、低头跪在水泥地上的父亲拳打脚踢。您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您搀扶着父亲回到家中，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副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挨斗用。

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您作为“特务嫌疑”“内控使用”已在1964年取消，但到了1968年10月，您又被医院革委会作为“地主分子”、“特嫌”，进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后来，同意由我和弟弟、舅舅轮流给您送饭。

我看到您的脚面肿得发亮，只能穿宽松的布鞋。您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扫地、刷瓶子、打扫厕所……为此，您始终毫无怨言；但对这种政治株连、对组织上迟迟不给您作结论非常不满。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多么想让厄运尽快地远去，回到那虽然艰苦但生活毕竟已好转的家庭和睦、平安幸福的年代啊。

做梦也想不到，由于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发生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八

随着时间延长，我跪着的两腿从疼痛到了麻木。我知道您被捆绑着下跪、支持不住歪倒的滋味了；咬牙摇晃着站立起来——

这完全是我这个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红歌当真、灭绝人性的儿子让您遭的罪！

2月13日夜晩在家里，当听到您说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警觉起来，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的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我们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

我的自利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和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0多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完蛋！

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的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号），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

父亲对我的行为及后果判断准确：对于您，他想遮掩也盖不住，除非把我这个“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一棍子打死！但是，当着您和舅舅、弟弟的面，他对我这个亲生儿子下不了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复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在您的冤案起因上，父亲有一种错觉。

1980年6月13日，您的冤案即将平反；因省里希望做成“安徽的张志新”案，佩兰姨来我家写回忆您的生平事迹材料。

当晚，父亲、小姨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父亲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您出事前，他已经“站起来”工作了，医院革委会也准许您回家吃住了，您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当时他想：固镇这个地方复杂，难道您能被暗藏的美蒋特务收买了吗？小姨说她也有类似想法。

父亲和小姨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又何尝不是！我们都缺乏精神病学的常识。而这一点，一直到我为您的冤案写申诉书、彻夜不眠、边写边哭的时候才想到！

我今年60岁，比您多活了16年。我和妻子与女儿、女婿、外孙一起生活。我们4个大人都中共党员。与您相比，我们入党根本没费劲！

我知道：作为党员干部和您的丈夫，父亲张月昇有很多缺点、错误。在与您结合后19年的家庭生活中，他没有给予您足够的体谅、关心和爱护；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告发而抛弃了对您的忠诚。不过，他绝没有想陷害您的念头！

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

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塄埂路边上“示众”；下放农村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插队落户的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犹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

县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是完全错误的。对此，10年后父亲有了新的认识。1980年6月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我们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奖赏”：当年您死后，我和弟弟成了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后代。初中毕业后，同学中的大部分干部子弟进厂、升学或当兵。10月，作为知青，我和弟弟去固镇连站公社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告发您没有任何好处：您被逮捕后，他把被子抱到东屋来，每天夜晚陪伴着我和弟弟睡觉。有一天，看到父亲拿起他20多年未摸过的针线，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缝补着自己的旧绒裤，我的心中无限凄凉，不由得想起了有您在的时候……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父亲与固镇区医院一位素不相识的丧偶女清洁工结婚。为了改变环境，他调五河县商业局工作，降职为副局长；我们跟着搬了家。在1974年“批林批孔”、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您的“罪状”成了父亲两次挨整（曾被免职）的原因之一。后来，父亲恢复了职务，一直工作到离休；2003年1月9日因病逝世。

在此，我代表父亲向您和去世多年的外婆、二姨、健在的小姨、舅舅及家人们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我们姓张的对不住老方家！我再次真诚地向您们道歉！

尽管有所谓“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但“反革命”的丈夫、子女的政治帽子却如影随形，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1972年，我招工到五河县机电排灌管理站维修车间当学徒。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我的政治信念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随着父亲官场沉浮，我的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为痛苦而哀伤，为满足而欢乐，甚至想去自杀！我没有看过医生。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慢慢地趋向理智，度过了心理危机。

十

难道我是一个生来就坏、本质下流的坯子吗？

古语说：“知子莫若母”。从一出生时起，您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着姐姐、我和弟弟。您们是儿女的第一位引路人；子女也是您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性格是父母的综合。

冤案发生前5天，我在小姨、舅舅插队落户的岗寺公社溧涧大队玩，您下乡来找我，见面不喊我“铁夫”，而叫我“憨子”。案发当天傍晚，您向在家里下棋的新汴河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憨子。”我愤愤不平：您不该这样称呼我。

当晚，在我使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官方语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对您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您告诫我：“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

前不久，舅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泽东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这些话使我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我：“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真的照着去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也许这就是您喊我“憨子”的原因！

有人说，谎言和誓言的区别是：前者是听的人当真了，后者是说的人当真了。而我把两者都当了真！为什么我失去自由行动能力赋予人类独有的尊严，让正常人觉得像个傻瓜呢？

十一

您对姐姐、我和弟弟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我要努力地工作，报答党的恩情。”您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对我们说：“疼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父亲给我们说他14岁参加新四军给指导员当通讯员、“皖南事变”随部队突围的七天七夜；您给我们讲自己冰天雪地在刺骨凉的河水中洗伤病员换下的敷料、深夜里点着马灯独自料理牺牲战士的遗体……您们要求子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团结同学，言行一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们努力按照您们的要求去做。

1956年3月，您担任怀远县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因热爱病人、工作认真，埋头苦干，参加了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您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们呢？在小学里，姐姐是少先队干部，我是“二道杠”中队委员。我们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您和父亲非常高兴。

文革前，在固镇县卫生科宿舍，尽管工作、学习忙，您还在业余时间把家属们组织起来，和她们一起学习“老三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团支部书记C姨领导下，姐姐、我和弟弟参加了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建院墙的工人们搬砖、打扫院内厕所、去火车站打扫卫生……

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县里红卫兵大破“四旧”，焚烧了古戏装、古籍、家谱，拆

除残存的庙宇等古建筑、砸碎了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人性论”、“尊卑孝悌”、“成名成家”等被作为“封、资、修”彻底批判，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性”、“革命感情”和“又红又专”；衡量、检验事物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最高指示”。

作为一个心智不全的13岁小学生，在我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被彻底抛弃了。在父亲和您赞许下，我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经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我们学毛著小队的小学生破例参加了第一批红卫兵！

父亲被打倒后，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毛泽东表扬少先队员写父亲大字报的鼓励，有刘少奇子女等贴父亲大字报的榜样，我贴出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等。在家里，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买菜做饭、洗衣刷鞋、打扫卫生、整理房间……

为了表达“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证明自己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我和您一起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您揭发批判父亲，但被造反派说成“避重就轻”，停止发言。我随后站起来，揭发了父亲叫姐姐写大字报留底稿等“问题”。

对于我的忤逆行为，您和父亲不仅没有批评过我一句话，反而把我当做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在我的心目中，已和您们平起平坐。这样的结果，鼓励了我积极地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最终丧心病狂地将您出卖！

妈！您、父亲和我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人，不会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做人太诚实了！然而，我们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主宰着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就足够有力，可以独立于本能需求、偏好或者环境做出选择。

既然您已看出我这个并不笨的孩子变成“憨子”，无论当时您正在遭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在下班之后、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您也应该和父亲商量一下，采取适当的、我能接受的方法开导、教育我，使我逐步懂得社会常识，有能力主动行动，自由选择，那该多好啊！如果您们这样做了，家庭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悲的是：由于受到自身的局限，您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

十二

1980年6月，您的冤案平反昭雪之际，佩兰姨来到我家。十年未见，百感交集，小姨和我抱头痛哭，夜不成眠；8月，为表达对您的忏悔和思念，我填《满江红》一词赠她：

泣涕滂沱，凭栏处、潇潇雨落。说不尽、我慈仁爱，众言金烁。十载奇冤终洗雪，千年遗恨常铭烙！岂能得、净水柳杨枝，翔云鹤。

从军旅，出东阁；群英会，奖拔获。卫真理、何惧地凌天虐！无意汗青留碾土，有情碑口安魂魄。怎寻回、忠骨葬家乡，傍芍药。

寻找到您的“忠骨”安葬——它仅仅是我们的愿望，或者说是一种比喻：如果有一天，您当年想说出的话可以公开发表；您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能够在人世间银屏、舞台上重现，那

就是您的“忠骨”得以真正地安葬之日！

您死后，为了表明与您划清界限，父亲和我根本不愿收尸；除了铺床席子之外，小姨、舅舅连一条多余的都没有，也无法安葬您。后来，舅舅和我们寻访到：您被县看守所在押人犯草草掩埋在刑场旁山芋地一处洼沟里。

1980年8月，您的冤案虽然平反昭雪、宣布无罪，但留下尾巴。不久，官方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案发当晚，您说：“我档案里有：我活着不能参加共产党，死了也要参加共产党！”为了实现您的遗愿，我们要求追认您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未果。

1982年清明，舅舅、小姨和我们就地为您捧起一座土坟；此后年年祭祀。

经舅舅出面申诉，1987年，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剔除平反判决中您“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事实情节部分。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开对“卖母求荣”的困惑，我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自己。当第一次读到明代宋濂的《猿说》中母猴将乳汁洒尽而亡、小猴抱着母亲的皮撞死的故事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猿猴尚且知其有母，不忍心看到它死，何况人呢？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很多动物对妈妈都表现出具有亲情的天性，而我却亲手把您送去枪毙！当年所谓“红卫兵”的我，连畜生都不如！

亲爱的妈妈，为了弥补我犯下的“弑母”大罪，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寻找时机为您说出您最想说的话，为您争一口气，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20多年中，我先后通过了中技、大专、研究生等不同阶段的在职教育，学习了机电、汉语言文学、法学等专业知识。我干过钳工、电工、代车间主任、律师工作者和公务员，现任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009年11月，因有人在网上撰文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谬论，我决定现身说法，就《固镇县志》刊登您的案例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您和父亲名誉、侵害您荣誉等为由，以县政府等为被告，先后向北京海淀、丰台区法院起诉，并在博客里公布了诉状全文，想以此唤起民众的关注、讨论和警惕。但法院不予受理。

我向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申请依法将您的墓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2012年8月10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固镇方面以您的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为由，第二次做出不能认定文物的决定，我向县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原决定。我向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该院维持原判。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回您的“忠骨葬家乡”啊！我这样做目的是：说出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以您的文革遭遇作“教材”，“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家巴金语）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它重演？

十三

让我幡然醒悟、懊悔不迭的是：您的家庭成分和父亲方雪吾所谓历史问题，竟然也是人为

制造的天大冤案！

在1993——2003的10年里，作为梅开舅的申诉代理人，我两次专程对方雪吾案调查取证，经研究发现：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我外公是高埭村的一位门馆塾师，中共党员。1928年，在党员项孟卿的帮助、配合下，他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求得翻身解放，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中共县临委书记章逐明派遣，他和项孟卿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从组织上控制了县党部领导权；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另外，土改时方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佃田，无中大型农具，远够不上当地划地主的标准！

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外公与同行W的关系很好，W的儿子与您订了婚。您参军后，因提出解除婚约，致使W子失恋而一度精神失常。W的侄儿到高埭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利用外公与部分群众关系不好等缺口，进行打击报复、蓄意陷害，借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将外公划分为地主成份，而且把他当做“恶霸地主”、“匪特（特务）”枪决！

我把外公案的申诉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但无人接受。

我如梦初醒！您在案发前说：“就是我死了，临死前也要告诉孩子！”上述事实与您生前所说是一致的。天哪！是我和父亲误解、冤枉了您，人为地把您当做“阶级敌人”，并把您送上了绝路！

十四

弟弟现在是一位执业药师，也有了孙辈，和我家一样，三代人在一块儿生活得很好。

我们的生活越满足，我就越是思念您，越痛恨自己无法弥补害死您的罪过：如果和现在许多老人一样健在，您也才87岁，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尽享天伦之乐。可这只是一个破灭的梦想！

痛定思痛。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和社会底层生活磨难，在外公、您和亲人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并在我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他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人类有绝对的道德原则：血缘、亲情关系胜过一切其他关系；守住人伦是做人的底线。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深切地体会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鋒维尔涅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他留下了“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箴言，在200多年后被无数次应验了，外公、您、父亲和我的遭遇是它的再次应验；《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观之树，它在“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气候中结出了一枚让我终身难咽下的苦果；长期地灌输正统的、不可置疑的统一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讨论争辩，不进行宪法至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治教育，搞彻底的人性改造——它在社会、婚姻、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交出了一份写满“吃人”两字的答卷！

在这封信上的署名，我仍使用您喊过的“张红兵”；并不是因为喜欢它，而是由于从那时起，我一直使用，现在想把公民身份证姓名变更为原名非常难。另外，我认为，姓名只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叫什么无所谓。假如那时有这样的认识，当初我就不会改名！

无论您的墓是否认定为文物，您短暂的生命因自身而闪耀光芒，树立起了一座朴实无华的纪念碑。

您永远活在我和亲人们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知道您悲惨遭遇的所有热爱和平、正义的善良人们心中！尽管仅44岁的您从世上匆匆而过，但是，您的音容笑貌却定格于永恒……

安息吧，妈妈！

（作者附记：此信写于2013年12月7—13日）

□ 原载作者博客2014-03-09（载2014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时有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原文。）

~~~~~

### 【拒绝遗忘】

张红兵为“弑母”道歉背后

• 姜浩峰 •

1970年，不满17岁的他将亲生母亲的“反革命言行”写了封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两个月后，他的母亲在公判大会现场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43年后的今天，他接受境内外各种媒体的采访，公开忏悔、道歉。

“我为自己有一位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对被我告发而冤死的妈妈进行忏悔；同时我还要声明：属于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的责任归我们自己，属于社会的责任归社会，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后者。希望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探讨和争论，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2012年8月3日，在固镇县举行的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方忠谋的长子、也是她“罪行”的告发者之一——张红兵，当众向母亲方忠谋忏悔、道歉。

1970年4月11日，安徽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女士，因替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鸣不平，并毁坏了毛泽东画像，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决。后经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查，于1980年8月14日平反昭雪。

### ◇ 道歉接踵而至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1953年9月，伴随母亲生产的阵痛，他呱呱坠地。父母给他起名张铁夫。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满13岁。那一年，张铁夫亲自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

2005年12月，张红兵开了几个博客，其中在凤凰网上的博客以“方张铁夫”为名。

当时，他早已是一名资深律师。而“方张铁夫”之“方”，来自其母亲方忠谋。

2009年11月16日，张红兵律师来到北京海淀区法院。这次，他是要为自己打官司。他以《固镇县志》的《〈方忠谋“现行反革命案”复查平反〉案例》涉嫌侵害自己和父母隐私为由，将该书作者安徽省固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发行者中国城市出版社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海淀区法院未予受理。

2011年8月，张红兵又向安徽省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其后，他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4月初，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2012年8月，在张红兵申请文物认定期间，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陈述道：“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被遗忘。”

与其他道歉者相比，今年60岁的张红兵，因为当年的所作所为遭遇到极致的心灵震撼，背负了更深重的心灵枷锁。他当年做的，除了分别贴过母校固镇县实验小学校长刘祥祯、“固镇县卫生系统头号走资派”——自己的父亲张月昇各一张大字报，1970年，由于他和父亲分别向县革委会人保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揭发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方忠谋被枪决。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因为“想逃却无处可逃，必须面对”。

1970年2月14日，张红兵的父亲张月昇向方忠谋提出离婚。当年4月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做出《离婚书》准予离婚。张月昇于2003年1月9日去世。

#### ◇ 那个“弑母”的黑夜

8月下旬，张红兵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讲述自己在“文革”中“弑母”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晩，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

张红兵回忆说，当时听到母亲说这样的话，他非常震惊。“在我的印象中，一贯紧跟党走、工作积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顿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张红兵说，“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

那一个晚上，天气特别冷，冰天雪地。因为激愤、恐惧和寒冷，不满17岁的张红兵不由自主地上牙“的的”打着下牙，浑身颤抖。

张红兵当时写的揭发材料名为——《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他在文末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接着，张红兵回到家里。在他发给《新民周刊》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如此写道：“在母亲将我们孩子住的东屋门头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她和父亲住的西头卧室里墙上的一张毛泽东画像、镜框里的一张《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等焚烧后，父亲和县公检法军管组负责人、军代表张排长等人进入卧室，对着我母亲的腿就踹了一脚，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后就像捆粽子一样，用带来的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捆人，现在都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声音，我的心一阵紧缩。”

说起母亲的案件刚发生时的感觉，张红兵说：“我的头‘轰’的一声，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个身体也仿佛不是自己的。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奇特、极端痛苦、无法忍受的感觉。我的这种痛苦持续了一个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无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觉。”

4月11日，是宣判的日子。那一天，张红兵到了公判大会现场。

“看母亲跪在台上，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男军人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她的手一松，她的脖子一拧，立刻就昂起头。宣判结束，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边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时，掉下了一只脚上穿着的黑色平跟带襻皮鞋。”

方忠谋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于枪决现场，张红兵当时已不愿前往。

记者问张红兵：“是否听说过‘亲亲相隐’的古训？对父亲举报母亲你怎么想？”张红兵说：“我在此案发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晚父亲离家外出时，并未直接告诉我说他出去报案。当时，我怀疑父亲不是真的去报案，于是自己写了检举信。如果当时父亲坚持不报案，按照我的坚决态度，极有可能将父亲、母亲一起告发，父亲就会因‘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名被抓，父亲、母亲将会一道被审判。”

张红兵坦承：“我还要向父亲道歉，因我的告发使他失去妻子，‘文革’中我还贴过父亲大字报，作为儿子的我不应当这样做。”

#### ◇ “大义灭亲”的好处

张红兵认为，《固镇县志》的《案例》涉及其父母和本人的文字严重失实，于2009年状告编委会和出版社。

《新民周刊》查阅了《案例》，其中写道：“方忠谋，女，民国15年（1926）生于枞阳县一个地主家庭……”

张红兵认为，母亲对家庭出身被划为地主成分有异议。他说：“早在1953年，母亲就对父亲说过，土改时全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田、半套农具；外公方雪吾一直教书；田地依靠自家的部分劳动、亲戚帮忙和农忙时雇请零工来经营，全家以农业收入和外公的教书收入为生。按当时政策规定只应当划为中农，而不该划为地主。只因为参军前家里为母亲与他人订过婚，对方要求结婚，母亲不同意并提出解除婚约，造成对方精神失常。这时，男方的一个堂兄弟被派到母亲家乡任土改工作队长，借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把我外公方雪吾划为地主成分，而且莫须有地以‘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中心组长’、

‘反革命杀人’等罪名，将方雪吾判处极刑，褫夺政治权利终身并立即执行。”1980年6月26日、27日，固镇县县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就方忠谋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对方忠谋的父亲方雪吾的罪恶和地主成分发现有疑点，尚需进一步弄清，请（宿县）地委考虑决定。”

同时，张红兵认为，《案例》叙述案情与事实不符。《案例》载明：“（1970年）2月13日晚饭后，方忠谋对正在刷碗的大儿子铁夫说：‘我活一天，还要劳动一天，不像你们天天高谈阔论，不做实际工作；天天在毛主席像前请示、问安，那是假的。我是相信、拥护共产党的。’铁夫反驳说：‘你反动！’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反动，我看刘、邓、陶、彭德怀他们是正确的！’铁夫说：‘你敢为刘、邓、陶翻案，我就用盆砸烂你的狗头！’正在内室看报的张月昇赶忙出来喝令：‘打现行反革命分子！’铁夫就拿起扁担与张月昇一起撕打方忠谋，无意中砸烂墙上的毛主席像。张月昇遂即故意激方忠谋：‘你敢撕毛主席像，罪该万死！有种的，你敢讲，还敢写吗？’……当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派人去拘捕她时，发现其又把陈伯达、江青等人的画像也烧了。”

“即使翻遍当年为方忠谋定案的全部材料，也找不到上述任何事实和情节，特别是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陈伯达、江青画像。”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1980年8月14日，宿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判定：‘经查，方忠谋参加革命后，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在部队曾荣立三等功，出席过安庆军分区英模大会，1950年11月转业后，曾出席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案例》却对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死者方忠谋的一贯政治表现只字不提。”

同时，《新民周刊》也了解到，尽管自参加革命后，方忠谋工作积极负责，政治上要求进步，1956年参加安徽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其家庭地主成分和父亲因“匪特”身份被镇压，她长期不能入党。凡此种种，让她对“文革”的态度经历了从积极拥护、产生怀疑到坚决反对的一个过程。

1970年方忠谋被枪决后，张红兵回固镇中学初二年级上课。有一天，老师喊他到校革委会旁边的一间空屋里，一位中年男子对他说，为了办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要画一幅肖像。“他让我左手拿着《毛选》，右手朝前方指着，意思是指着我的母亲进行批判。”张红兵说，后来，“大义灭亲——固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事迹”就被做成展板，放到固镇中学一排教室中的“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室”。

然而，张红兵和他的父亲并未因“大义灭亲”获得更多“名利”。方忠谋案发后，张月昇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交了《关于提出要求给我们结论的请示报告》，要求在方忠谋没有处理之前给自己和孩子“做出结论或证明，防止在今后政治运动中对遗留问题扯皮不清；要求组织上、领导上承认孩子的革命行动，和他们坚决要求脱离母子一切关系，要求今后在政治上不依现行反革命子女称呼和看待，对他们今后报名参军上学等方面问题在政治审查时，不因此问题受到限制，也不因此问题而增加他们的思想包袱”。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县人民医院革委会、公安局、法院专为此事写过证明，至今张红兵还保存着上述文件。

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在母亲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或是升学，或是进部队当兵，我们作为‘黑五类’子女，又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去农村。父亲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后，一直是正科级干部。但在母亲的冤案发生后，他离开固镇县卫生科调动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行政职务从科级变成了副科级，就是降级使用，直到他退休。受母亲冤案株连，我的小姨母方佩兰、舅父方梅开都下放农村劳动，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

改革开放以后，张红兵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法律专业等函授学习，离开工厂调入五河县司法局、法律顾问处从事律师等工作，先后任安徽省第三经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现在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执业。

2010年，固镇县一居民在方忠谋墓地东侧建房，堵住了通往墓地的通道。经张红兵举报，该房屋被认定为非法建筑，须自行拆除，但该户一直未履行，相关部门也未予强拆。为此张红兵曾向政府申请过行政复议，还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在官司对抗中，固镇县政府提出，方忠谋的墓也是有问题的。根据《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禁止在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水库、河流堤坝两侧建造坟墓。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因此，方忠谋墓不在保留范围。这一认定猛然提醒了张红兵：“我要以申请文物保护作为切入点，争取把母亲的墓地保留下来，把非法变成合法！”

“关于母亲墓认定文物一案，我将选择适当时机依法申诉。”他对《新民周刊》表示，“1980年此案平反时，方忠谋曾被誉为‘安徽的张志新’。根据固镇县有关部门电报通知，我姨母方佩兰专程赶到固镇县写出材料，书面提出了为方忠谋彻底平反昭雪、修建烈士墓等5项要求。当时固镇县委赴五河县调查组也与父亲和我谈话。”

方忠谋冤案发生时，只比张红兵大4岁的舅舅方梅开当晚也在现场。他说：“我大姐被判死刑，是张红兵和他父亲要求的！”

方梅开谈到大姐方忠谋在“文革”后遭遇的一系列变故：1966年，方忠谋的女儿也就是张红兵的姐姐，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第八次接见革命师生活动，感染脑炎回固镇家里几天就去世了；1967年，丈夫张月昇被固镇县卫生系统造反派揪出来，戴高帽游街批斗挨打尿血；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方忠谋自己也因“地主分子”、“特务嫌疑”被单位隔离审查、交代、劳动，限制人身自由长达2年。

方忠谋被枪决后，方梅开有近10年没有与张家父子来往，直到1979年前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方梅开与自己的小女儿方佩兰，主动催促张红兵父子为母亲的案件写申诉。当时，他们父子还认为时机不成熟。直到张志新事迹被报道后，张红兵才积极行动起来。如今，方梅开非常支持外甥张红兵将方忠谋的墓申请认定为文物。

#### ◇ 我为什么会卖母求荣

在方忠谋冤案的发生地固镇县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到现在都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这么绝情地要求判处妻子和母亲死刑？

有多种说法——也许是为了自保，求得撇清与方忠谋的关系？也许是为了自己理想的纯洁，宗教般的虔诚，不惜奉上最贵重的祭品？也许是知重刑为获轻判而教训一下方忠谋？

而张红兵并不避讳地告诉《新民周刊》：“确实有自保的念头。”

自保后的张红兵，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生活，这一段往事的影响，伴随其一生。“1998年，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一次，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任何人说张红兵，他都不愿意调解。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你还是同意调解吧！’”张红兵告诉《新民周刊》。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



住我，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亲被枪决，对张红兵的人生影响，远不是多年后才发生的。

从方忠谋案发那一刻，张红兵就感受无穷压力。他称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在此期间，他停止了记日记，当然也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服，硬是自己扛了过来。“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让我忧心忡忡：广播、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镇压影响到母亲的一生；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抑郁最严重时，我甚至想过自杀，逃避现实社会。”

从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常常梦到母亲。他告诉《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而张红兵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则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直到父亲退休后，有一次张红兵陪伴父亲回老家，在去刚修建的桐城火车站的路上，他和张红兵谈起这起冤案的责任问题。张月昇说：“我们家出了这个事，我应该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和家长。”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表现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如今，张红兵认为，“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困惑、学习、反思、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张红兵还说：“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 摘自《新民周刊》

~~~~~

【诚心忏悔】

我的“文革”经历

• 刘伯勤 •

1966年夏，我14岁，在山东省济南一中读书，老初一，就是所谓“老三届”中最低

的一届。我们这一届，是“文革”前入学（1965年）的最后一届初中生，也是“文革”时最小的中学在校生。

我们学校，建于20世纪初，是济南也是山东省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原称省立一中，占地面积广大，教学设施、实验设备齐全。学校有一大群优秀教师，学生经初中、高中两次筛选，高考入学率很高，“文革”前是济南市重点中学，学子并家长都趋之若鹜。中共济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视，这点从干部配备上也可看出：校长王伟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13级；副校长朱琳（女），老革命，行政14级；党支部书记王景三（女），行政15级。仅上述条件，与其他中学就拉开了距离。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东省政协大院宿舍里。“文革”前夕的政协，已从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权力的议会性质机构变成纯粹的统战机关。当时山东省政协的领导是一些年龄大、资格老、声望高但已不适合在一线顶岗的老干部，或者级别较高但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或有这样那样问题被控制使用的干部。驻会常委、委员，则是些党内高龄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国民党军起义或被俘将领、民族资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等。机关内设机构，则比照厅局级机关设置。

◇ “文革”的爆发，可以说是“救”了我

1966年6月的某周，适逢我们班劳动。记得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用地排车往学校拉东西，班主任许俊源老师迎上我们说道：“明天起学校不上课了，我们班也不劳动了，参加‘文化大革命’。”

那年春天以来学校就不平静了，批《海瑞罢官》、“三家村”、《燕山夜话》，好像也刮拉（牵连）上了本校的老师。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关心这“不上课”，是这一周不上课了，还是怎么着。就问道：“是这星期不上课了，还是永远不上课了？”许老师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说：“永远不上了！”

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他当时的眼神、口吻，我都历历在目！许老师兴许是可怜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讲，才这么说。我们哪里想得到这些，立刻“啊……”欢呼了起来。别的同学或许想的只是不上课可以玩儿了，对于我，还包含着解除了留级的危机！啊，我解放了！

“文革”前小学升初中，也是考试入学，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来小学的尖子生。但进入中学后还是产生了分化，像我，就没从新鲜劲儿里转出来：上课根本不认真听讲，老琢磨着玩儿的事，学习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语，几乎没背过几个单词，到后来，上英语课几乎像听天书，老师和同学读课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数，就感觉有越来越多的题不会做了，下学期期中考试，竟得了59分，不及格。老师批评我，反认为是老师跟我过不去，就干脆琢磨起怎么对付他，绝对属于班里的“琐矣（调皮、捣蛋）孩子”。一次上代数课，教代数的班主任许老师提问，我忽发奇想，想捉弄一下许老师，于是举手。许老师看到我举手，以为我要“学好”了，认真听讲进步了，就叫我回答。我站起来却质问他为什么昨天到家中“告状”（家访）？立刻把课堂气氛改变了，我这里还得意不已。还有一次是下学期开学不久，一个下雪天，天气阴暗，北风呼啸，泛巴拉子（雪霰）不停地从屋顶瓦缝里吹进，班里同学在上自习，我跑到黑板上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教室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一幅是外面不下了屋里还下小雪，又在旁边写了“抗议”两字，这是对老师不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在教室“挨冻”发牢骚。想想不妥，又加了“不敢当”三字，也引起部分同学起哄。到了春天，许老师看我越发不像话，就组织七八个同学开会帮助我。先是有女生义愤填膺，控诉我捉弄她们的种种事例，我则满不在乎，不以为然。这时另一位男生放了“重炮”，提起我画漫画的事，说：“刘伯勤‘抗议’，抗

议的谁呢？就是抗议党抗议人民政府！”记得当时我吓了一跳，许老师和批我的女生也愕然了。就在这时，突然地震了（好像是邢台地震的余震），许老师立刻让散会，才算是给我解了围。就这样，我自己也渐渐感到了“危机”，慢慢在班里混不下去了。这学期期末考试，教政治的蒋明老师又出了个“怪招”，开卷考试，要大家写进入中学以后各方面的进步，这下我可作难了。蒋老师教学方式比较特别，她说话诙谐，把一门乏味的课讲得有声有色。她上课，乃至批评我，我都不好意思不听。这题目下我要是编，肯定会被她戳穿，那样更没面子。没办法，我只得交了白卷，在试卷上留了一段话，明确说我要么是当成语文课的作文编造一篇故事，要么写不下去，因此我选择了实话实说，但保证今后改正缺点云云。蒋老师竟然在班上宣读了我的留言，还表扬了我“诚实”，给了我60分及格。不管怎么说，到1966年上半年，我已经很难混下去了，成绩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提上来的，况且要骤然转变，在平常啦到一块儿（谈得拢）的同学眼中又觉得“掉价儿”，可若再不改弦更张，下场必定是降班（留级）。这个时候突然说“永远”不上课了，搞“文化革命”，那危机就算解除了，所以我心里高兴，所以才欢呼了起来。

◇ 批斗师长

停课以后，大家还是每天到校。党支部抛出了六个“牛鬼蛇神”，作为批判对象。学校再也不是清静之地了，高音喇叭震天价响，办公楼和各教学楼内外全是一层层的标语和大字报，连道路两边也拉起了绳子，挂满了大字报。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开大会上台发言，不管是什么“理”，还能说个道道，我们初一学生，也就是跟着瞎起哄，胡狗乱（胡闹），但都在极力表现自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志，这样一来，这六位老师就遭了大罪了。

六位老师中有毕德质、郑世经、孔庆珊、张家璇、辛建岭，还有教导主任李昌义，每天除了批斗就是强迫劳动，其间挨打挨骂是经常的。记得一次开批斗会前，这几位老师低头弯腰从办公楼里鱼贯而出，两边挤着不少学生，不时有人伸手打过来的老师。看着别的同学动了手，一瞬间我也“心动”了，瞅着谢了顶、被勒令不许戴帽子的李昌义先生过来，照着他头顶就是一巴掌，接着又朝他后背啐了一口吐沫……所有的老师都一声不吭，忍受着来自他们学生的殴打、谩骂，屈辱地从人群夹缝中穿过。说实在的，我脑子里也曾闪过一丝不忍，但周边的气氛，以及手打到李主任头上那略微弹起的“快感”，立刻就把这一丝善念冲掉了。那年月，“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雷锋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过后多少年，我曾无数次回忆起当时一幕，每次都是赶紧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不敢正视那一刻以打人为快的齷齪念头。

那时候，随便哪个学生在校园里遇见“牛鬼蛇神”，都可以任意呵斥，老师们没有一点儿尊严，斯文扫地。一次，我遇到了毕德质老师，想起听说《牛鬼蛇神之歌》是他作词谱曲的事，觉得好玩儿，便喝令他停下唱了一遍才放他走。还有一次，看到毕老师与另外几位“牛鬼蛇神”排着队不知到哪里去，又喝令他们必须边唱边走，一直到他们走远。有哲人曾说过：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可当年哪里讲这些，“亲不亲阶级分”，“好人打坏人，活该！”阶级敌人根本不被当作人，可以任人侮辱，没有谁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愿不愿这样被人作践，愿不愿家人看到自己被人糟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我20岁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

1966年盛夏以后，揪斗对象早已不限于原来党支部抛出来的几位“牛鬼蛇神”。“大民主”之下，表面上凡还没有被认定为敌人的人都可以写周围任何人的大字报，揭发任何哪怕道听途说的“问题”，但任何人第二天也可能就是那个被莫须有的罪名击倒的人。发生在教我们图画课的胡熹和老师身上的事，就是一个例子。胡老师是在我们学校教了一辈子美术课的老先生，有同学的父辈都是胡老师的学生。他年长而和气，永远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就这么一位老先生，突然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成是国民党，且反动透顶，妄想变天复辟，证据就在他的画中，说是他的画里有“反动标语”，打倒谁谁，谁谁万岁，与我们平常喊的口号正好相反。于是，他的画被挂满了校园，要大家从中搜寻罪证。我也曾傻乎乎参与了这事，声称从他的一张漫画

中找到了36条“反动标语”！胡老师的漫画非常简洁，往往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图景。可正是这样简洁画中的横、竖、斜线条，被说成不同字的不同笔画，被分析为构成这个那个字，进而又组成一句句口号。36句口号，又不能记（你记到纸上岂不变成了你写的反动口号！），一会儿就搞混了，也就报个数字。回想起来尤其可笑的是，在我和其他许多同学想象出的反动口号中，竟然有“打倒毛主席”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完全不合乎常识！他既然恨你，怎么会以职务衔名相称？！这些个如今看来无比荒诞的事，那时大家却都深信不疑。仔细考究下来，这做法好像也还不是一中师生的发明。记得那之前不久，有报道北京批判某画家就曾用过这类构陷手段，我们只是跟风而已。

我校朱琳副校长，是一位资格老却似乎不受重用的干部，因而在“文革”初也被抛了出来，可却抓不到她什么重要把柄，于是扣个“三反分子”大帽子，一直就是劳改，在风头最劲的那轮批斗中，反倒没遭大罪。1967年春，学校组织在千佛山下果园里劳动，也就是拔拔草什么的。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忽然就有了嘿唬（吓唬，训斥）她的想法，走到朱校长跟前，直呼其名：“朱琳，你为什么反党？”朱校长说：“我不反党！”我用当年最无理、最蛮横、最常见的口吻质问她：“你不反党，为什么被揪出来了？！”朱校长转脸看了我一眼，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说：“你们还小，不懂，等长大了就明白了。”我觉得她太不拿我当回事儿，朝她吼道：“你不老实！小心点儿！”其实已是色厉内荏了。朱校长头也没抬，不卑不亢地说：“我认识你爸爸、妈妈。”真的假的？反正这下轮到我不自在了，谁让我自讨没趣呢！只得讪讪地走了。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我想，朱校长说不定还记得这一出呢，这应该是朱校长落难中一段出彩的插曲。

◇ 抄同学家

进入8月，整个社会上都乱了，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口上古旧书店门前，在马路中央堆起了一米多高的线装书焚烧，过往车辆都得绕着走；大明湖北极阁里的元代泥塑、千佛山上的隋代造像等等，都被砸毁；街头商铺的老牌匾全部被砸，有些道路、商场也被改了名；所有绾髻的老太太，几天时间都剪成了短发；留长辫的姑娘，也都剪成了短发或短辫；里弄小巷时常弥漫着焦糊味道，那是有人家在偷偷地烧旧书或者怕给自己带来厄运的物件……就在这个时候，从北京刮来了抄家风。

开始抄家的是我们“黑字兵”，又被称为“黑老保”，属于保守派。“黑字兵”以“红五类”自居，但还是以所谓“革干”（革命干部）、“革军”（革命军人）子女居多，也最活跃。其标准形象是带军便帽，穿一身旧军装，外扎军腰带，左胳膊上箍着袖章，上面“红卫兵”三字是黑颜色的，寓意为烈士鲜血写成。要打人时就解下军腰带，抡起来没头没脸地抽。若是皮带扣朝外，抽到头上必是血肉模糊。运动初期抄家是以所谓“破四旧”、查抄枪支电台“变天账”等反动物品名义展开的，对象是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以及历次运动中被揪出来的人，名堂五花八门。在学校里，抄家对象就是父母属于这些人的同学。这个标准十分荒唐，比方说地主、富农出身的同学，他们父母最晚也是从新中国成立时就在城市里谋生的了，却还得依照祖籍地祖父辈的个人成分确定他们的家庭出身。我们班里同学这一时期被抄家的至少有四位，我参加了抄张念泉、韩桂英同学家的行动。

张念泉同学的家，完全是由本班同学去抄的。他家并不属于“黑五类”，只是他父亲中学毕业后留校任用，抗战初随济南各中学撤退到四川绵阳编入国立六中，抗战后返回济南，分派到某学校教书，算是在旧政权公立机构里工作过，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就凭这一点他家怎么会被抄的。

自上初中以来，我与张念泉的关系一直不错，去他家抄家，心里着实抹不开面子。即使如

此，张念泉也没流露半点儿反抗、不满的情绪，还得配合着搬家具查看后面或底下藏没藏东西，有没有暗洞。我们照着电影《地道战》里的情节，拿棍子戳地（听声音），敲到他家堂屋，硬说八仙桌下有洞，怀疑底下埋了枪、电台。张念泉说没有，我们哪里肯信，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挖了有小半米深，自然是什么也没挖着，一个个没劲了，就不了了之了。从张念泉家里没抄到任何所谓“反动罪证”，连属于“四旧”的物件及金银、存折也没有，现金不过五六十元，他家就是一户再寻常不过的挣工资过日子、“撑不着也饿不死”的普通市民。

韩桂英家住舜井街南段路西一个院落的三间西屋，抄家时她不在，只她母亲在家。当天我们在她家也没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一个外班的同学手里拿的棍子不小心拨拉到了挂在堂屋正中墙上的毛泽东相框。相框掉到地上啪的一声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儿惶恐——户主再反动，你也不能把他家里毛主席像砸了啊。他像是掩饰似的，赶紧蹲下，清理碎玻璃，打算把里面毛主席像取出。就在他把毛主席像往外拿的时候，发现了后面藏的蒋介石相片。

蒋的相片共32张，比现在5吋彩照小些，有戎装照，也有便服照，码了4沓，夹在毛主席像与相框背板之间。那时代只是电影里才有一闪而过的蒋的形象，我们也不真切地清楚蒋的形象，因而也很好奇，拥到一起，都想仔细瞧瞧蒋究竟是什么模样。但相片立即被高年级的红卫兵收走了，说是（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不管怎么说，这下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去了。

韩桂英她母亲立时就挨了打，被扇了耳光，拳打脚踢。原本抄家都要结束了，这下大家又来了劲，重新把她家翻了个遍，并且这次就没个好了，看什么不顺眼，啪嚓就给摔了。我也顺着那个思路看别的相框后面有没有东西，将墙上大概是韩桂英奶奶的一位老太太的相框，一棍子砸下来摔碎了，在相片后面露出来4沓10元面值的现金，数了数一共是200块，被我们抄走了。韩桂英家院内有一口井，全院住户都打井里的水吃。我们问韩桂英母亲里面藏没藏枪？藏没藏电台？她母亲嗫嚅着说没有。我们自然是不信，却也根本不用脑子想想，枪支电台泡在水里算个什么保存法！找了长竹竿往井底扒拉，院里其他住户也不敢多说话，任由我们折腾。可除了一只掉了底的铁筲（水桶），什么也没捞上来，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抄家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一直以炫耀的口吻跟别人吹嘘这段“传奇”，虽然“首功”不是我的，但我抄出了200块钱，是“第二大功”！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文革”中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

抄韩桂英的家的理由，是她出身资本家。她父亲“文革”前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据说新中国成立前这照相馆就是她家开的。抄家后我还专门去明湖照相馆看过。明湖照相馆是泉城路（“文革”前称院西大街）上一处门头平房，约有四五十平方米，分为营业和拍照两个区间，用拉帘隔开，还有一个里间做暗室，不知有多大。工作人员不过七八人。想来新中国成立之前韩桂英父亲经营时，顶多雇用两三个帮手，也许就带一个徒弟，这情形搁现在也就算个个体经营者。她家存的蒋介石照片，估计是当年给客户洗印照片富余，出于职业便利而留存的。这与有现行行为的犯罪是不同的，按照《刑法》是无罪的，即使按当年恶法“公安六条”（1967年1月颁布）来衡量，仅仅“保存蒋介石照片”，也不能构成反革命罪。还有，“文革”初像韩桂英父亲这样老职工工资顶多五六十块，要负担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时大多数家庭都属于现在所说的“月光族”，往往没到下月发工资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他三四个月的收入，也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存款。当年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不是多数家庭所能拥有，条件略好家庭一个月存个3块、5块，要攒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钱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我真不敢想象后来她家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被抄家后，我没见韩桂英再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后来我们班拍的毕业照，

也没有她。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 捉弄高邻

恶作剧本是孩童顽皮的特征，历朝历代任何国家地区的孩子都可能做得出来，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段对特定人群实施恶作剧，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欺侮不能还手的弱者，体现的是人性之恶。“文革”时我家住的山东省政协大院内，有许多民主人士，“文革”初他们遭了难，而我又在此时捉弄他们，加重了他们及家属的困厄。

周志俊先生是著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后，卧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报纸。我曾好几个夜晚与伙伴一起，用缝纫机线轴绑上皮筋做弹弓，劈开冰糕（竹）棍一端，夹着小鞭炮作箭，穿在线轴孔中，点燃后捅破报纸射进去，使他和家人在沉睡中受到惊吓，我们则乐不可支。

还有一位宋文田先生，是留美硕士、著名水利学家，为山东人民，乃至河南、陕西、四川人民治河修桥，兴利避害，干了不少好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水利厅厅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改任省政协常委。我曾多次与伙伴夜晚潜入他家门前葡萄架下偷葡萄，偷吃之后扒他的窗户往里偷看，往往见他还在台灯下看厚厚的英文书，嘴巴翕张不已，喃喃作声。我们把脸紧贴到窗玻璃上扮怪相，然后敲玻璃。宋文田先生系老知识分子，看书非常专注，这样下意识地回身一看不免吓一大跳，我们则坏笑着跑掉。宋文田先生对人，尤其是大院里的孩子非常和善，我们却这么捉弄他，实在是作孽！

杜大中先生原是国民党军少将，后随军起义，“文革”前任省政协常委。那时住的是平房，家家门口一侧檐下都接有一间一面坡的小房作厨房，这厨房没有门，敞开的。一天半夜里，我与伙伴悄悄潜入杜大中先生家厨房，将油、盐、酱、醋等全和在一个盆里，让他家没法再用，只得倒掉。这个瞎包事（坏事）的“主谋”和“主犯”，都是我。第二天，杜大中先生的夫人不知怎么猜到是我干的，找到我母亲告状，我还拧着脖子死犟，不肯承认。

在“文革”初，人性扭曲变得正常。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女——心理狰狞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以欺压、折磨人为业、为乐；居于社会被统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被打倒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统战对象和黑五类子女——只得在高压下就范，对于暴力残害束手就擒，逆来顺受。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定是罪孽膨胀勃发，恶行习之为常。就我个人而言，可能还有已不能刺激我记忆神经的瞎包事尚未交代忏悔，每忆及此，则不胜惶恐！

◇ 罕见的抗争者

“文革”中山东省政协机关造反派打人是非常普遍而又厉害的，据说是上至厅局级干部，下至公务员（那时机关公务员属于勤务工人），无不动手，出手必狠，凡经批斗者无人能幸免，以至于一位副秘书长先是造反，也参与打人，以后自己被揪出，自知活罪难熬，夫妇俩一起上吊自杀。还有一位处长，被诬为“叛徒”，不堪毒打，也上吊自尽了。但也有人在残酷批斗中不屈服，不自污，他们的表现或机智或坚强，在黑暗的日子里透露出光亮，传递了希望，令人钦佩！

揪斗1926年入党、时年已70岁的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邵德孚先生后，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广播了批斗纪实，其中邵德孚先生的“×××（是一位也已年过70的党员驻会常委，后来也被揪出批斗，并遭殴打）你打呀！你打呀！”之语，是他们为批邵德孚先生“不老实”而引用，

却使得邵德孚先生面对强暴顽强抗争的形象隐然可见。

章培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的长兄，抗战后曾任陆军大学机甲战术系中将主任兼第四期将官班主任。1927年他任浙江省省防军第六团团长期间，放走了列入逮捕名单的弟弟章秋阳等12名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又一说为陈云）。1949年章培先生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战史组长、装甲教授研究会第一副主任。一次周恩来参加学校活动时认出了他，主动跟他打招呼，当众对他当年救命之恩致谢，这令章培先生十分感动。1958年章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1967年初夏，政协机关造反派斗起了他，且做法极其野蛮。一天傍晚，在机关后院高台南面，我们正在玩耍，四五个造反派不知为何喝住了正欲回家的章培先生，没说几句话就开始了暴打。有人啪啪啪啪，连续正反抽他耳光，只见他胸膛挺直，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头被抽打得来回摆动。接着又有人从后面猛地一脚踹在他小腿上，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狠狠地栽倒在地，但立即又爬了起来，笔直地挺立着，任由造反派继续暴打，没有呻吟，更不求饶……

虽然此前我动手打过老师，也见识过不少红卫兵打人的场面，但像这样毒打老人的情景却还是头一次见。章培先生那年已经74岁，遭一帮正值青壮年，受党派遣做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当众暴打，令围观的我们看得心惊肉跳，没有一个人敢出声。时间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相信，当年在场的孩子中仍会有人清晰记得这一幕的。章培先生的气概，那个时代只有电影、小说中共产党员受刑上法场才有，而国民党无不是贪生怕死的样子，可我们却亲眼见到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被一帮人毒打也如此坚贞不屈，与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认识全不相同，故而印象深刻。

这次暴打之后，曾听得一造反派悻悻地说：章培给周总理写了信，周总理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杨得志派人找了来，不让打他了云云。据说，章培先生给周的信中写道：“我不求你们像我当年对你们那样。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只请你们按照你们的俘虏政策对我！”不卑不亢，义正词严，不是讨饶，更像是斥责。即使这样，没过多久，章培先生还是又被当众痛打过一次。

◇ 反思与忏悔

大约是在1966年8月，社会上流行起一副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完全颠覆了以前公开宣传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从我个人来讲，感觉不过是把以前只做不说的事情公开化了。早在1964年和1965年，政协大院有两位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的孩子参加高考，都落榜了，被分配到青海支边和郊区农村插队，政协机关还曾分别为他俩开过欢送会。还记得会上他们不情愿又无奈的表情，难以掩饰，勉强挤出来的笑容是那么不自然。院里大孩子告诉我，他们“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没用！”所以血统论对联，对于我这个没有多少知识又自以为站在真理一边，头脑发热血脉偾张的毛孩子，就不能不像打了鸡血似的狂躁，渴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功立业”。看着相熟相好的同学受难，我也曾心有不忍，也曾心里不柱壮（不踏实），却又随即暗自庆幸自己不是生在他们那样的家庭！接下来不管我们红卫兵怎么胡作非为，打人、抄家、烧书、砸文物，等等，中央对我们都是支持的，尽管《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法，但各级党政、公检法对于打人打死人的事当场不制止过后不追究，那还不是纵容？更像是支持和怂恿嘛！是不是出于我们的父辈不便出面而由我们出手的策略考虑？这就不容我们再怀疑，相反，我还曾为自己的“不坚定”、“资产阶级人性论”暗暗羞愧。因而那个阶段，尽管坏事做到熟人那里会有抹不开面子的感觉，但有了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脸一黑就过去了，我没往深里想过，也不认为自己做得不对。

到了1966年十一前后，我母亲也被打倒了。那时她在济南市历下区一所民办半工半读中学当校长，每天要到学校接受批判，皮肉之苦自然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家还算没遭大变故。到了年底，一天我从北京串联回来，一进大院，就见满院标语大字报，一直到我家门口，全是我父亲的，指我父亲是“叛徒”，我一下子就懵了。不久，我们家就被政协机关的造反派抄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干部的“历史问题”格外看重，在白区工作曾被捕的同志、作战被俘的同志，都需要自证清白，凡不能者，几无不受怀疑的。对被捕被俘者以道德高标衡量，使得这部分同志往往有口难辩。因此，党内斗争中“历史问题”一直是一把利器，掌握它的一方用以制人，如同抓住了对手小辫子，无往而不胜。我父亲被打倒了，且无翻身之可能，我们家变成“反动”的了，由“自来红”到“自来黑”，我也成了“狗崽子”。

开始我对这场变故接受不了，曾连续在家躲了几天不出门，不愿见人。之后我想，不管怎么说我父亲这种情况还得算党内矛盾，与政协大院内及社会上涉及“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富农资本家”之类的固有敌人不同，我与他们子女也还是有区别的，因而我没有必要太自卑。有了这种想法，我尽力让自己表现如常，有时甚至还更夸张一些。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加自作多情——随着我父亲的“被揭露”，我已经被划入另册了，我与曾经被我欺负过的“黑五类”同学其实是同类人！于是我转而慨叹党的“出身不由己，重在个人政治表现”的政策落实出了问题。继而又觉得自己施害“同类”的行为被看了笑话，我开始——也只是为此——感到了羞愧。

1971年“9·13”后，个人崇拜的神话破灭，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很自然地松动了。这时我已成年，经过了上山下乡又回城当了工人，与许多人一样，对自身经历和国家发生的事有了自己的想法，已经不再认可关于“文革”、“阶级政策”等等宣传了，在内心深处，对于人为以阶级划限，确定远近亲疏，制造并任意扩大贱民阶层（黑×类）的政策深感厌恶，我已能够确认“文革”初参与的对同学、师长、邻里的恶行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忏悔只在心中，我还是没有勇气把话明确地说出来，向他们当面道歉。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的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但许多问题尚没有搞清，社会对“彻底否定”也远未达成共识。例如，许多“文革”初期施害，后来也曾受害的人，往往仅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或被示于人，比如当初的老红卫兵（济南的“黑字兵”），其实就是“文革”打砸抢的始作俑者，但在清理“三种人”阶段却被剔除在外。这不符合真相，仍然是歪曲的历史。对于“文革”中那些纯粹的受害者——例如我的经历中那些师长、同学、高邻——而言，这比往他们伤口上撒盐好不了多少。再如所谓“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提法，如果是受害者在得到真诚道歉后发自内心的回应，那才是值得肯定的；假使加害方对受害者没有实质性的抚慰，反而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么对他们无疑是又一次刺激，和解的指望除了变成奢望还会是什么？又如以动机论来开脱发动“文革”的罪责，似乎也被不少我们这类曾加害于人的红卫兵借用，自我麻痹，讳疾忌医，甚而以攻为守，反过来质疑真相探讨者的动机。其实动机论不仅是“文革”的一个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也曾是“文革”整人的技术手段——对不合己意的言论斥之以“别有用心”、“动机不纯”，再对言者论者加以迫害。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思想没有被这些东西统一，我用我自己的脑子想了几回问题。虽然“文革”是一个太大的课题，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更非我个人能力所及，但作为经历者，在过了快半个世纪以后，面对后辈的追问和良心的拷问，我没有勇气装没事人似的泛泛斥责“文革”，闪烁其词也不过是自欺欺人，我必须面对，必须就自己的罪错向受害者道歉，向逝者在天之灵忏悔。

我曾经向张念泉等同班同学当面道过歉。虽然曾受过我的伤害，虽然“文革”改变了他们人生进程的应有轨迹，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怨恨我以及当时的社会，但他们无一不转而安慰我，反倒劝我应该历史地认识和对待“文革”中的自己。我感觉到了人性的差距。如果不公开地向其他曾遭我伤害，且已逝去、不能面见的同学、师长、高邻忏悔，就无异于对他们家人亲

属继续隐瞒，我就无以感谢那些善良的同学的宽宏大量，更无以拯救自己的灵魂。我深知迟来的道歉并不能折抵加于他们的伤害，但我仍然冀望他们在天之灵及其家人亲属感受到些许慰藉！

衷心祈愿“文革”历史不再轮回，我们的后代永不重复我们的童年，人人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 原载《我们忏悔》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